

法国汉学家桀溺藏书及其汉学研究

刘蕊 岑咏芳

内容摘要:法国著名汉学家桀溺(Jean-Pierre Diény, 1927-2014),早年旅居中日期间,先后购得一批与汉学研究相关的书籍文献,其中不乏版本珍稀者。其中,《诗纪》为清康熙年间刻本,当是在修订明万历年间文枢堂版的基础上,配以贞隐堂等版而成,版本复杂特别;《姓氏谱纂》以“朱”姓为首,版本亦殊。笔者借编纂简目之便,得窥全貌,今为文介绍,以期海内外学者予以关注。桀溺先生一生致力于汉学研究,尤其在中国诗歌研究方面,见解独到,成就卓著。所译注的《古诗十九首》为其开端之作,影响殊深。此外,《牧女与蚕娘—中国文学的一个主题》、《中国古代龙的象征》、《曹操的诗歌 155-220》等也是其汉学研究的代表著作。

关键词:桀溺 《诗纪》 《姓氏谱纂》 汉学研究

法国著名汉学家桀溺(Jean-Pierre Diény),1927年出生于法国阿尔萨斯省(Alsace)的科尔马(Colmar)市。曾在法国国立高等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主修文学,并研读古希腊文及拉丁文,取得大学文科教师资格;随后于国立东方语言学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师从汉学泰斗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教授,开始攻读汉语,并在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随师研习汉籍。1955-1958年获得梯也尔基金会(Fondation Thiers)资助,得以继续深造^①。1959-1962年又获东京法日会馆(Maison franco-japonaise)奖学金,赴日本从事汉学研究。并于1964年中法建交之际,居留中国两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法文。“文革”爆发后,经香港返回法国。1970年起担任巴黎高等实践研究学院

^①据胡若诗《法国汉学家桀溺采访记》(《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桀溺先生曾在阿尔萨斯的一所高中任文学教师三年,随后在戴密微教授的推荐下,被一所研究基金会录取,重新开始对汉学的研究。此研究基金会当即梯也尔基金会。

第四组,历史与语文系研究导师(directeur d'études),至1997年退休^①。2014年春离世,享年87岁。

遵照遗愿,桀溺先生的家属将其所藏与汉学相关的书籍^②捐赠给斯特拉斯堡大学(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中文系图书馆^③。笔者受桀氏高弟,现任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杜德兰(Alain Thote)教授所托,有幸为这批书籍编纂简目。整体而言,桀溺先生所藏文献类目丰富,以普通古籍和近现代文本居多,但其中亦不乏稀见中、日古籍珍本及名家藏本,值得关注;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这些书籍又是其收藏者研究领域与学术兴趣的重要体现。

一、藏书

桀溺先生对中国文化各方面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时又具有深厚的汉学素养,对于书籍的爱好亦十分广泛。他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访学东京、北京等地,购买了大量与汉学研究相关的文献,涵盖中国传统古籍、近现代书籍和日版书籍,共159种。当中既有经学、史地和文学类,也有书画、宗教等方面的文本。例如:诸子类有元禄十六年(1703)冈田屋嘉七刊《朱文公童蒙须知》;经学类有延享二年(1745)江都书肆嵩山房刻《六经略说》等;地理类有宽政元年(1789)序经折本《唐土历代州郡沿革地图》,嘉永三年(1850)刻《清二京十八省疆域全图》;天文类有元禄二年(1689)刻本《天文图解》,诗文类有清初翻刻明末刊本《诗归》、《诗纪》,宽文六年(1666)刻《冷斋夜话》;类书有明末刻《姓氏谱纂》等等。

首观中国传统古籍一类,共计41种,经部、史部各9种,子部6种,集部17种。集部又尤以诗文类收集最丰,这自然与桀溺先生在中国诗歌研究方面用力最勤关系密切。

从文献版本的角度考虑,则以《诗纪》和《姓氏谱纂》两部古籍最值得关注(下文详细讨论)。另有《诗归》(分:《古诗归》十五卷五册;《唐诗归》三十六卷十一册),亦名《古今诗归》或《古唐诗归》,明钟惺,谭元春选定,刘敦重订。版式为白口,单鱼尾,半叶10行19字,小字双行,四周单边,无直格,板有漫漶。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钟惺序(前有补钞),谭元春序,吴士晋书。钤“鹤堂藏

①关于桀溺先生的生平,巴斯蒂夫人(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于2016年2月发表于《高师同学录—特刊》(Archicube 19bis)中的《桀溺悼念文》(Diény Jean-Pierre),有详细的叙述。亦可参见先生的另一高弟马如丹(François Martin)于2014年在《中国学研究》(Etudes chinoises) n°33-2上发表的悼词(In memoriam Jean-Pierre Diény)。

②据桀溺先生的女儿Claire Diény叙述,她父亲曾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购得一批儿童教科书,由于不在本次捐赠之列,笔者尚未得见。

③斯特拉斯堡是阿尔撒斯省首府,而斯特拉斯堡大学图书馆乃世界著名图书馆之一,藏书300余万册,仅次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此省是桀溺先生出生与成长之地,是他一生萦念之所。

书”印。全文不避讳“玄”，当为清初（清康熙朝前）翻刻明末刻本。此外，清嘉庆丁丑（1817）刻《御定历代题画诗类》、清刻本《通俗编》等刊印精良，亦为较好的版本。

桀溺先生所藏日版书籍合31种，其中3种属稀见版本，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其一，东条文左卫门著《清二京十八省疆域全图》，一册，嘉永三年（1850）刻本，须原屋伊八等梓，钤有“冈田正之”印。冈田正之（1864-1927），字君格，号剑西，曾任东京大学文学部助教授，为日本汉文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①。其二，井口常范编《天文图解》五卷，五册，元禄二年（1689）刻本，钤“金泽文函”印，或属“金泽文库”旧藏。金泽文库原为日本中世纪武家北条氏政权的文教设施，日本建治元年（1275），北条实时在称名寺内设立文库收储其所藏全部日汉书籍，始为金泽文库。在日藏汉籍中，金泽文库藏本可与“足利本”相提并称^②。上述《清二京十八省疆域全图》、《天文图解》于日本公立图书馆未见藏本。其三，武井骥所著《刘向新序纂注》十卷，十册，文政六年（1823）刻本，长沼府藏板。查得，爱知大学简斋文库藏有玉枝轩刊本，八册^③；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亦有藏本，八册。桀溺先生所藏可与此二者互校，乃为海外稀见版本。

桀氏在留日期间，不仅热心于搜购书籍，还与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1904-1980）、兴膳宏、福井文雅等结下了深厚情谊。

近现代书籍部分数量最多，共86种。当中有不少是汉学研究的工具书，目录类如《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藏书续目》、《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又有《室名索引》、《历代统纪表》、《汉语古文字字形表》等。书籍来源上，购自中国书店者较多，书衣钤有“中国书店”印章，并写有册数和定价，如《古玩指南》、《北平岁时志》、《清式营造则例》等。个别书籍还随附“出境火漆”。中国书店成立于1952年，坐落在北京琉璃厂，旧时的“文奎堂”、“来熏阁”、“松筠阁”等私营书坊皆被并入中国书店。桀溺抵京时，中国书店自然成为他购买书籍的不二选择。

此外，笔者在整理桀氏藏书时，发现大多数书籍都钤有藏书印。除了上文提及的冈田正之旧藏《清二京十八省疆域全图》外，当中不少亦系名家旧藏本。现按照刊印先后胪列于下，也可借此探寻桀氏藏书之渊源。

日本宝永元年（1704）刻《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十二卷，十册，钤“鹤峰藏书”印，此乃日本国语学者鹤峰戊申（1788-1859）藏书印。鹤峰氏将西方语言学引入日语研究，著有《国语学大系》、《语法新书》等^④。

①参见李庆：《日本汉学史 第1部》（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65-467页。

②有关“金泽文库”之详情参见严绍璎：《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62-269页。此外，该本与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本为同一版本。

③经笔者查阅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即：“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detail>），查阅时间为2017年6月6日。

④成春友，汪捷：《日本历史文化词典》，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70页。

日本嘉永二年(1849)刻《孝经》(又名《重刻古文孝经》),一册,钤“紫芝园”印,为日本江户时代汉学者太宰春台所有。太宰春台(1680-1747),名纯,字德夫,号春台,又号紫芝园。有《春台先生紫芝园稿》等,为日本古文学派代表人物之一^①。

日本明治十三年(1880)奎文堂刻《历代地理沿革图》(又名《李氏历代地理沿革图》),一册,钤“泷川氏图书记”等印。“泷川氏”即日本汉学家泷川君山(1880-1945),名龟太郎,字资源^②,著有《史记会注考证》等。

清光绪十年至十四年(1884-1888)上海申报馆申昌书画室石印本《点石斋画报》,五册,钤“小泽文库”印。“小泽文库”乃日本近代著名园林建筑师、学者小泽圭次郎(1842-1932)的私人藏书^③。

清光绪十四年(1888)湖北官署刻本《尔雅义疏》^④与民国震华阁印书局铅印本《天文仪器志略》,皆钤“青木晋曾藏之”印。青木晋,曾肄业于北京大学,与服部宇之吉(1867-1939)、狩野直喜(1868-1947)等一同就职于东方文化事业会,著有《追忆在华三十年》等^⑤。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广雅书局刻本《三国志考证》八卷,二册,钤“湘乡陈毅鉴藏”、“陈毅”、“诒重”印。陈毅,字诒重,号郇庐,清光绪三十年进士,其藏书楼“阙慎室”积藏30多万卷,颇负盛名^⑥。

日本明治二十六年(1893)东京筑地活版制造所排印本《唐宋八家丛话》二卷,二册,钤“增田”印。该本乃作者增田贡自藏本。增田贡,号岳阳,善诗,日本明治时期汉学家,著有《清史揽要》等,与王韬、黄遵宪等交友^⑦。

民国辛未(1931)铅印本《书目答问补正》五卷,二册,钤“盩山精舍”印。民国时期,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徵曾以盩山精舍之名印行上百种珍本秘笈,被当时学人视为精品^⑧。

①参见张静:《日本学者太宰春台〈诗〉学研究》,《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19卷第4期;徐复观:《徐复观全集·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57页。

②参见:http://base1.nijl.ac.jp/infolib/meta_pub/detail,查阅时间为2017年6月6日。

③参见:http://base1.nijl.ac.jp/infolib/meta_pub/sresult相关介绍,查阅时间为2017年6月6日。

④另钤“默堂藏记”印一枚。

⑤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日本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日文论著目录》,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1984年,第49页;陈衍:《石遗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第708页;太初节译:《东方文化总委员会及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之概况》,收录于李孝迁:《近代中国域外汉学评论萃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46-554页。

⑥参见王云:《〈滇志〉琐记》,收录于《西南古籍研究(1987)》,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页;万里主编:《湖湘文化辞典》(6),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30页。

⑦参见金绮秀:《日东记游》,收录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2015年,第361页;忻平:《王韬与中日文化交流》,收录于中国中日关系研究会编:《日本的中国移民》,三联书店,1987年。

⑧参见吴忠良:《柳诒徵与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学报》2012年第4期。

民国二十三年(1934)铅印本《国立北平图书馆书目》,一函两册,钤“宝玲文库”、“庆应义塾图书馆印”。“宝玲文库”为二战后旅居京都的英国人佛朗克·豪勒(Frank Hawley)之藏书,后归日本庆应义塾图书馆所有。

民国二十五年(1936)铅印本《古本道德经校刊》,一函三册,钤“李煜瀛”印。可知该书为我国近现代著名生物学家、教育家李煜瀛(1881-1973,字石曾)旧藏^①。

日本昭和十八年(1943)刊印《书道汲古》第一卷,一册,青蓝书塾发行,钤“福泽悦印”、“青蓝仙史”二印,应是作者日人福泽悦三郎自藏本。

民国开明书店铅印本《六十种曲》,六函六十册,钤“申泉文库”、“柴田藏书”两印。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昭昧詹言》(文库17 W0058)亦钤此二印,系土岐善麿旧藏^②。土岐善麿(1885-1980),为日本中国文学、日本文学和日中比较文学研究家、翻译家、歌人。曾任日本艺术院会员、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顾问、私立武藏野女子大学文学部教授^③。

民国大成书局重印本《六朝文絮笺注》十二卷,一函四册,钤“陈钦仁”印。陈钦仁(1900-1976),字青筠,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研习新闻、政治、历史等社会科学,获硕士学位。1927年回国后在上海创办英文《中国评论周报》。后长期主持英文《前峰报》工作。1949年赴台后曾任《自由中国评论月刊》编辑^④。

另一《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钤“邝庆欢印”、“邝印”等,内题“邝庆欢 1989HK”。邝庆欢^⑤乃桀溺先生之高足,在海外昭君研究者当中成就卓著,此书乃邝氏1989年购自香港,或因昔日师徒间借阅之故而存桀溺处。

纵观桀溺先生藏书,类目丰富,不拘一格。他既重视古代典籍的收藏,也不忘对中国近现代出版的古籍整理类图书的搜罗。被誉为欧洲汉学界之祭酒的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将“目录学与藏书”和“与中国学者的接近”总结为治“中国学”的必备条件之二^⑥。先就“目录学与藏书”这一点而言,桀溺

①李煜瀛,1902年留学法国,1912年回京创办留法俭学会,1920年任北京中法大学西山学院董事长,同年赴法创办里昂中法大学,1925年任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中方委员,后历任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北平研究院院长(参见吕章申主编:《中国近代留法学者传》,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第176-181页)。

②参见:http://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html/bunko17/bunko17_w0058/index.html,查阅时间为2017年6月6日。

③林煌天主编:《日本翻译辞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71页。

④参见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7册,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第307-310页。

⑤邝庆欢(1944-1990),在巴黎第七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旋被聘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所撰《王昭君研究》于1986年由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出版。

⑥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4)(1923-1927),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11页。

先生可谓身体力行,不仅藏书量在法国同辈汉学家中是佼佼者,而且利用目录版本学知识,选购到不少珍稀文献。而在“与中国学者的接近”这一点上,笔者以为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是与中国学者的直接接触。桀溺先生曾在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两年(1964—1966),对中国及中国文化有了切身地体悟,与同行学人间的切磋往来亦能想见。二是与中国学界的间接交流,即通过著作、文章等学术成果得以了解当下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现状。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所藏的中国近现代出版的图书中略知一二。譬如:杨立诚根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改编而成的《四库目略》,乃四库入门书籍,依此可通晓中国古籍之精华。而中华书局早期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或稍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掌握中国古籍善本庋藏状况的重要工具。

桀溺先生常以“文献学家”自称,他由衷欣赏清代以来学者们的博学与方法^①。或许正是如此,他本人在书籍的选择上并非单纯的以珍本、善本为前提,而更看重其实用价值。

二、比较独特的《诗纪》与《姓氏谱纂》

虽然桀溺先生选购古籍并不以善本、孤本作为准则,但在其收藏中却不乏稀见者,《诗纪》、《姓氏谱纂》即为桀氏藏书中两种版本独特的中国古籍。

《诗纪》一百五十六卷,共十函一百二十册,明冯惟讷汇编,方天眷重订。版式为白口,单鱼尾,半叶9行19大字,小字双行34字,四周双边。内封题“王凤洲冯北海汇订/文枢堂藏版”^②。钐“雨山草堂”^③印。前附“凡例”、“引用诸书”、“目录”。

《诗纪》主要由《古诗纪》三十六卷(第一至四函)和《唐诗纪》(第五至十函)两部分构成。

首先,《古诗纪》的重订者除海宁方天眷以外,尚有王玘、吴中珩、俞策。另外,卷三十隋第五(诗纪 一百三十四)之后窜入“盛唐第九十”。全本不避讳“玄”,如:玄化,傅玄,《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亦不避讳“弘”,如:《广弘

①胡若诗:《法国汉学家桀溺采访记》,《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

②该内封混入《唐诗纪》第八册。

③即长尾雨山(1864—1942),字子生,号雨山、石隐。为日本明治时期汉学家,主要研究中国诗词、书画、篆刻等。该本与《中国善本书提要》中著录的四种北大藏明万历年刻本皆不同:(1)《诗纪》156卷,目录36卷,《唐诗纪》170卷,目录34卷,60册,9行19字,卷内有“日暝斋图书记”、“蒹葭藏书”、“林兴之印”、“林季雒”等印;(2)《诗纪》156卷,目录36卷,32册,9行19字,卷内有“盱台王氏十四间书楼藏书印”、“云窠书牧”等印;(3)《诗纪》156卷,目录36卷,40册,9行19字;(4)《诗纪》156卷,目录36卷,40册,9行19字,卷内有“种桐仙馆珍藏书籍之印”等。(参见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37—438页)。

明集》。因此,笔者推测:《古诗纪》所用刻板当为清入关以后,清圣祖康熙登基之前(约1644-1661)所雕。

再者,《唐诗纪》,明李明睿阅,方一元汇编,方天眷重订^①。明万历乙酉(1585)方沆序,以及利瓦伊桢^②序。内封题“李本宁李太虚两先生重订/文枢堂藏板”。

相较于《古诗纪》,《唐诗纪》的版本状况更为复杂:

其一,“初盛唐诗纪序”版心刊“何鲸刻”。何鲸,明嘉靖间苏州地区的刻工,曾参与吴管本《唐诗纪》等书的刊刻^③。

其二,初唐二十六题“吴中珩汇编,陆弼同校”;盛唐第一百八题“吴中珩汇编,俞体初同校”。

其三,第九至十函共二十四册,为“中晚唐诗纪”,内封题“中晚唐诗纪/古吴龚野遗手辑/半亩园藏板”。详情如下表:

函	册	版式
第九函	1-2	白口,单白鱼尾,半叶9行19字,左右双边,板面有剝剔。明正德乙亥(1515)秋七月吉河中东峰刘成德序;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张洎撰“张司业集序”
	3-6	白口,无鱼尾,半叶9行19字,左右双边
	7	白口,单黑鱼尾,半叶9行19字,左右双边
	8-9	白口,无鱼尾,半叶9行19字,左右双边,板面有剝剔
	10	白口,单黑鱼尾,间有单白鱼尾,半叶9行19字,左右双边,板面有剝剔
	11-12	白口,无鱼尾,半叶12行21字,左右双边,版心刊“贞隐堂”,板面有剝剔
第十函	1	白口,无鱼尾,半叶9行19字,左右双边
	2	白口,单黑鱼尾,半叶9行19字,左右双边
	3	白口,单白鱼尾,半叶9行19字,左右双边
	4	白口,无鱼尾,半叶12行21字,左右双边。明嘉靖乙未(1535)严嵩原序
	5	白口,无鱼尾,半叶9行19字,左右双边
	6	白口,单白鱼尾,半叶9行19字,左右双边
	7	白口,无鱼尾,半叶12行21字,左右双边,版心刊“贞隐堂”
	8	白口,无鱼尾,半叶9行19字,左右双边。“鲍溶”以后:白口,无鱼尾,半叶12行21字,左右双边,版心刊“贞隐堂”

①另有方湛重订。

②利瓦伊桢(1547-1626),字本宁,湖北京山人,明隆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著有《大泌山房集》(参见九江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名人咏九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7页)。

③瞿冕良编著:《中国古籍版刻词典》(增订本),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75-376页。

9-10	白口,无鱼尾,半叶12行21字,左右双边,版心刊“贞隐堂”
11	白口,单黑鱼尾,半叶9行19字,左右双边
12	白口,单黑鱼尾,半叶9行19字,左右双边。“汪遵”以后:白口,单白鱼尾,半叶9行19字,左右双边。“裴说”以后:白口,单黑鱼尾,半叶9行19字,左右双边

贞隐堂,为清初文人龚贤(1618-1689)室名。龚贤,字半亩,号野遗。凡版心刊“贞隐堂”者皆为“半亩园版”,行字为半叶12行21字。“半亩园版”将“胡”、“匈奴”等字剔除,如“誓扫□□(匈奴)不顾身”,但不避讳“玄”。而另一种行字为半叶9行19字者,则当为文枢堂版。文枢堂乃明万历间金陵吴桂宇的书坊,刻印过吴管编《唐诗纪》170卷^①。该版不仅将“虏”、“匈”等字剔除,如“岁岁但防□(虏),……□(匈)奴不系颈”,还避讳“玄”,可知其刊印时间应在清康熙登基之后,晚于半亩园版,是以“文枢堂”为底版修订而来。再者,《中晚唐诗纪》部分并不避讳“弘”,如“送卢弘本浙东观省”、“送弘志上人归湖州”,可推测其刊刻时间应在清康熙至雍正两朝间(1662-1735)。

是以,桀溺先生所藏《诗纪》当在修订明万历年间文枢堂版的基础上,配以半亩园(贞隐堂)版拼合而成,或还掺入少数《诗纪》的其他版本,曾为日本汉学家长尾雨山旧藏,后转为桀氏所有。

再论《姓氏谱纂》,虽名为谱牒之书,实际内容则广引人物,以“朱”为首姓。先述姓氏渊源,再叙该姓古今名人事迹。《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类书类》^②收录有山东省馆藏明崇祯元年武林鲁氏刻四六全书本(以下简称“四六全书本”),七卷,明李日华辑著,鲁重民补订,钱蔚起较(校)定。白口,无鱼尾,半叶9行,大字不等,小字双行38字,四周单边。前附沈兆昌序、明周九烟撰《百家姓新笺》。《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八云:“旧本题明李日华撰……然周星为崇祯庚辰进士,《新笺》后有自跋,称成于崇祯丁丑,日华为万历壬辰进士,没于崇祯初。其作是书,不应反用周星之《新笺》,殆出伪托。其书不详谱牒世系,而广引人物,非滥即漏。虽日华以书画擅名,不长于考证,亦不应谬漏至此也。”^③是书被定作伪书,系后人托名李日华所撰。中国国家图书馆(索书号:t4136)、北京大学图书馆(索书号:SB/313.386/4064)亦藏有明末刻本,七卷,十册,版式与四六全书本同^④。

桀溺先生所藏《姓氏谱纂》为明崇祯年间刻本,七卷,二册,钤“陈毓坚印”等,版式与四六全书本同。然而,桀溺先生藏本与四六全书本二者在装订顺序

①瞿冕良编著:《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增订本),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4页。

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二〇一》,齐鲁书社,1995年。

③《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八》(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第1818页。

④国图藏本序文部分有纸张残损,北大藏本《百家姓新笺》末尾残缺,到“余乃戏取帙中诸字”止,缺其后“析割而经纬之……九烟甫漫识”半叶。

上略有差异。然而,就品相而言,桀溺藏本比之国图、北大藏本,则略胜一筹。

除上述七卷本《姓氏谱纂》以外,中国国家图书馆另藏有明刻《姓氏谱纂》(索书号:15537)四卷。前附沈兆昌序文及《百家姓新笺》,行款、装订顺序与四库本同。该四卷即《新笺》卷一至《新笺》卷四,正如周九烟《百家姓新笺》中所述“原帙计四百七十二字,中为奇姓者四百有八,为复姓者三十,并附结语四字。悉循旧章,亡所裒益,本有讹漏,尚俟将来云。九烟甫漫识。”所以,四卷本涵括原本中408个奇姓,30个复姓,起自“朱”,止于“乚”,合438个姓氏。而七卷本则起自“朱”,止于“夹谷”,较四卷本多了“散姓卷五 上平下平”、“散姓卷六 上去入”、“覆姓卷七”(补遗 共六十一姓附后)三卷。由此可见,《姓氏谱纂》最先为四卷,后补增三卷,合为七卷,共收录姓氏1139个。

综上所述,《姓氏谱纂》一书主要分为四卷本和七卷本两种,七卷本乃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增补而成。桀溺先生所藏为七卷二册,目录置于“沈序”与《百家姓新笺》中间,装订次序不同于别本。

三、汉学研究

桀溺先生毕生倾力于汉学研究,藏书亦与其学术研究紧密相关。我们可以从《通俗编》、《子史精华》、《唐诗金粉》、《姓氏谱纂》等几部类书,自然联系到他的《从类书到通检》、《中国的类书》这两篇论文;由《三体诗法讲义》、《国译汉文大成》、《汉诗讲座》等,想到他的《日本人论述中国文学的一些见解》;再从《郑板桥全集》想到他的《郑板桥的家书》。另外,前文注释曾述及桀溺先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购得一批儿童教科书,笔者推测,这批书籍应与《世界是你们的——中国与儿童书》的成书关系密切。

桀溺先生的中国学研究,乃源于对艺术史的兴趣,尔后以研究古典诗歌为开端。亦如前文所述,桀氏家藏书籍中,诗文一类最为丰富,这与他在中国诗文研究方面的丰硕成就亦相印证。文学本质与文学批评是其非常注重的两个方面,他研究古诗的目的,是为了真正深入其中,去探讨古诗之所以在中国受到一致称赞的原因。《古诗十九首》(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起源:关于汉代抒情诗的研究》、《牧女与蚕娘》、《曹操的诗歌》等是桀溺先生在古典诗歌研究领域的代表作。

《古诗十九首》是桀溺先生留居日本期间,完成的第一部译著。其优雅的译笔、严谨的态度,为汉学研究树立了典范。桀溺先生在重译《古诗十九首》时,先于每篇后附上各家的评注,再比较和辨析评注间的不同,最后得出自己的主张,颇有“注疏经典”的意味。如此一来,桀氏对《古诗十九首》的翻译,则突破了原有英、法、德等译本只是忠于原本,却“取消了诗歌的意蕴”的缺陷。并且,他还从抒情特点、结构艺术、新创的悲观主义三个角度考述《古诗》与《诗经》,尤其是与《楚辞》间的渊源和创新,从而探究其独特性。此外,在桀溺先生看来,《古诗》最独特的是其整齐、和谐的结构艺术,这一点又反映了人的天性

与文化之间的平衡。而《古诗》作者的美学追求与十七世纪法国古典戏剧家遵循的“三一律”有吻合之处。其他诸如此类的异文化间的联想和比较,又进一步拓展了学者的眼光^①。

《中国古典诗歌的起源:关于汉代抒情诗的研究》这部论著恢弘廓大,广博精微,为先生取得了1967年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铜牌奖和1998年的法兰西研究院铭文及纯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Institut de France)的吉尔斯(Giles)奖。桀溺先生是从“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角度”,论述中国古典诗歌的产生、发展和特点。既不拘泥于分类学的研究,也不仅限于社会历史方面的考察^②。

《牧女与蚕娘》一书,先后从“羊群和桑林”、“桑园的祭祀和传说”、“从民间传说到文学”、“一部杰作的后继作品”四个方面,分别考述汉乐府《陌上桑》和法国十二世纪行吟诗人马卡布律(Marcabru)的牧羊诗如何在历史中衍变和被解读,以及她们在各自文学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作者“根据一个多世纪以来对牧女诗歌所进行的研究,考察一下中国的这一文学现象,同时希望这种考察,反过来能指导我们对罗曼等语言学家们的设想进行正确的判断”^③。

《曹操的诗歌》是桀溺先生多年研究曹氏父子文学的重要成果。此书分别从政治、休闲、抒情三方面,对曹操的诗歌作了全面的翻译与注疏,藉此对这位战略与文采兼备的历史人物,作了颇具深度与广度的诠释。先生对中国文学源流的探讨,可见于他以汉代为经、以诗歌为纬的各种论著。他不但对诗歌中的美感、意象,以及潜伏于社会与心理下的种种因素感兴趣,并对历史编纂的手法予以高度的关注^④。

随着对诗歌研究的深入,桀溺先生进而关注到文学作品背后潜在的象征体系,尤其是“太阳”和“龙”两个象征符号的多重意义。研究成果见诸《中国古代龙的象征》、《中国文学的想象词汇——太阳的象征》、《凤凰与长生鸟》等论著。至于史书的编纂以及笔记研究方面,《从类书到通检》、《谢安(320-385):根据〈世说新语〉之琐言看一个中国士族》,则可视作这一领域的代表。

除上述对古典汉学的研究,桀溺先生还参与译介了法国著名剧作《安提戈涅》。此外,他全面翻译了郑板桥的《家书》,以及一本自选的中国古诗集:《山水游戏——中国之绝句与律诗》,翻译了81位诗人的122首佳作。

《中国古代对宇宙的形象比喻和表述——论文选(1962-2006)》则是他离世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论文集,可以说是桀溺先生的一部精神遗著。桀氏将他1962年至2006年散见于各文集与学刊的论述与书评,以及自1969年至1997

①参见钱林森:《中国古典诗歌在法国——论文集〈牧女与蚕娘〉导言》,《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1期。

②参见钱林森:《中国古典诗歌在法国——论文集〈牧女与蚕娘〉导言》。

③钱林森编:《牧女与蚕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59页。

④参见巴斯蒂夫人:《桀溺悼念文》,《高师同学录——特刊》2016年2月,第178页。

年在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年刊上的学术报告,精选出41篇总汇成册,并对每篇文章均作了精细的修改。该论文集涵括五个部分:史学(16篇)、诗学(9篇)、象征(12篇)、结语(2篇)、悼念(3篇)。值得一提的是,先生晚年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诗文中的鸟类,可惜撰文未及完成。也借此机缘以《所谓黄鹂的历史》为题作为第一章《起源》,附于册中。时任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伊维德(Wilt L. Idema)先生为此书写了书评,赞誉这是一部丰富而涵盖广的论文集,并说:“他优秀的学术成果,将代代启发研究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学子。”^①

汉学家私人藏书是域外汉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际汉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它既能自成一体,是汉学家学术兴趣的一种直接体现,往往与其汉学研究关系紧密,又可融入整个域外汉籍的大范畴中。这一点在桀溺先生的藏书与汉学研究中可见一斑。

于治学,桀溺先生拥有深厚的语文学功底,注重从文献角度研究文学。通过追溯文学作品间的源流关系,爬梳文学史同文学观念的发展脉络。同时,他善于把握不同文本细节的异同,另辟蹊径,视野独特,并具启发性。

法国汉学家戴廷杰(Pierre-Henri Durand)教授曾这样描述桀溺先生:“他并不是我的论文导师,他在索邦大学任教时,我曾听过他的课,后来交往密切。十几年来,我们共同抽出一些时间,来整理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我因此有机会目睹了桀溺先生无懈可击的严谨的治学态度,欣赏他那优美的文笔,同时也了解了他宽宏大量、谦逊、关心他人的高尚人品。他是我治学与做人的楷模,是我中国意义上的老师。”^②这或可作为我们认识桀溺先生为学与为人的最佳见证。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幸蒙杜德兰、戴廷杰、柴剑虹、黄仕忠诸先生的宝贵建议和帮助;还有John Finlay先生对英文提要的修改润色,谨此致谢!

【作者简介】刘蕊,女,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研究方向:域外汉籍研究,近代学术史研究。岑咏芳,女,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古籍部主任。研究方向:佛教文献研究,法国汉学史研究。

^①T'oung Pao(《通报》),2013,P.543。

^②高黛英:《法国汉学家戴廷杰访谈录》,《文学遗产》2005年第4期,第150页。